

容闳的世界:19 世纪全球化下的中国

[美] 理查德·S. 霍洛维茨 (Richard S. Horwitz)

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历史系

摘要 本文探讨“大 19 世纪”期间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的过程,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仍属孤立的断言是夸大其词。19 世纪的全球化有三个主要特点:跨地区、跨国家、跨大陆网络的出现;全球范围的趋向一致;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个体、家庭乃至国家均是全球人类共同体的一部分。这三个特点或称三个过程在 19 世纪都曾对中国社会发生影响。文章以在美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容闳(1828—1912 年)为个案,考察其经商、从政及作为政治活动家参与革命的过程。容闳的个人生活和政治、商业与教育活动反映出全球网络、全球范围的趋同及日渐崛起的全球意识对个体生活的影响,由此窗口读者可窥见 1840—1914 年全球一体化进程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 容闳 19 世纪 全球化 中国 中国的教育委员会 自强清王朝

1872 年,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出版了他的科幻小说《八十天环游世界》,在这部小说中,一名死板的英国绅士投资家费利亚斯·福格带薪离开他居住的伦敦城市生活,与他的贴身男仆、前杂技演员“路路通”,开始乘坐蒸汽机轮船、火车——中间偶尔骑大象、乘沙滩快艇——在 3 个月内周游世界。一路上,福格和“路路通”经过苏伊士运河,从印度教徒女婿手中搭救了准备用于献祭的帕西女王,在穿越美国中西部“大草原”时,他们打退了美洲印第安人对火车的袭击。虽然它也许不是伟大的作品,但是凡尔纳的小说是他所处时代的完美展示。铁路、蒸汽机和电报带



来了迷惑的感觉：过去似乎终生遥不可及的地方现在仅仅几周或几天就可以到达；信息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只需要几个小时，地球一端做出的决定能够迅速地影响地球另一端的生活。长期受到帆船和马背速度影响的人类共同体正在经历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所说的“时空压缩”。小说所传递的信息是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时间正在过得越来越快^①。

在凡尔纳的小说中，中国只扮演着匆匆一瞥的角色：当贴身男仆被拉入香港的一间鸦片室时，福格与“路路通”分开了，然后叙述他匆匆走过上海的一个公共汽车站。这也许一点都不令人吃惊。从根本上说，在世界历史的任何其他时代，在任何全球视角的叙述中，中国都必须被看做极其重要的一个地区：在两千年里，它是一个商业和技术发明中心。但是对中国来说，“漫长的 19 世纪”（通常界定为 1780—1914 年）是一个内部动荡和外敌入侵的时代。清政府力图统治不断增加的人口，解决环境危机、宗教派系、国际商业扩张带来的贸易逆差和社会问题。工业革命给欧洲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技术优势和在世界各地实施强权的能力。在互相竞争和寻求市场及原料的贪欲驱使下，西方列强要求维护他们统治全球的权利。相比之下，在中国，官员和知识精英似乎思想保守，不愿接受外来思想和组织制度方式。对于批评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人来说，清帝国似乎处于凡尔纳所说的大转型边缘。

但是这种 19 世纪的看法被夸张了。它把军事和政治弱点与被动性混淆起来，忽视了 19 世纪全球重塑日常生活的方式。从跨太平洋移民劳工和他们供养的华南地区的家庭，到在东亚和东南亚商业网络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中国商人，再到为适应新的全球政治规则而努力的外交使节和政府官吏，再到那些力图把清帝国转变成现代中国的具有全球意识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中华民族被深深地卷入 19 世纪的全球化。

—

漫长的 19 世纪是全球化时代的形成阶段。它的根源是 1780 年左右开

^① Jules Verne,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tr. William Butch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关于时空紧缩，参见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p. 240.



始的发展。工业革命开始改变人类、环境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1770—1820年,政治革命席卷美国和欧洲,并开始重塑国家与其属民之间的关系。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蒸汽机和电报才开始遍布全球,这些变化开始显露给随意的观察家。历史学家尼亚尔·弗格森写道:

大约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以今天看起来熟悉的方式走向繁荣。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达到空前水平;跨越大西洋的海上航线和电报从未如此繁忙,因为资本和移民向西行、原材料和制造品向东行。与产量相关的是,机器和资本出口的水平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达到。

弗格森对大西洋经济一体化的描述也适合太平洋和印度洋网络。现在人们一般认为,19世纪后期经济一体化(特别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40年里)是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扩张的时刻,而且——如果没有两次世界大战引起的衰退,“大萧条”和“冷战”——过去30年里走向全球经济转型的先驱^①。

经济数据虽然重要而且发生了急剧变化,但不能完全反应复杂的现实。全球一体化具有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弗格森提到的例子来说,大规模移民涉及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作为经济投入的劳动力再分配那么简单。移民使不同背景的各民族变成近邻。有时候,结果是积极的:经济繁荣、教育、更健康的生活的新机遇。在其他情况下,结果则更为复杂:为了争夺资源的不同民族的接触也会酝酿社会冲突、暴力和种族歧视。在移民定居下来的城镇和乡村里,有些人失去了父亲和儿子,有些人从与遥远侧翼地区的接触中获得利益。移民将自己的思想、文化背景和社会组织带到新地方,同时学会适应邻居的陌生思想和文化。旅行者带着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思想返回故乡。贸易和移民的循环引发了传染病,包括霍乱和鼠疫的再度爆发。

^① Niall Ferguson, “Sinking Globa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84. 2 (March-April 2005), 64; 更详细的论述, 参见 Jeffrey Frieden, *Global Capitalism: 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on, 2006), pp. 1 - 123.



19 世纪全球化过程有三个典型的因素:网络的发展、全球一体化的出现和人类作为一个单一共同体意识的增长。新的交通和通信技术有助于形成比以前联系更多民族的更大网络。这些网络是“更紧密的”——即联系更频繁、范围更大。信息交流的速度和效果都急剧地加快了^①。与此同时,正如杰出的历史学家 C. A. 贝利所指出的,19 世纪也“给国家、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生活带来了全球一体化”,诸如健身、服装和发型的选择等日常生活也全球一体化,有时这是一个精心选择适应外来方式的过程,这些外来方式似乎有效,有时它涉及思想、时尚或组织机构模式的潜意识借鉴^②。

最后,19 世纪已把世界作为一个互动的、人类是一个单一共同体的普遍意识的出现而著称。大量旅行记(有些是偶然的、有些是系统的)证明人们对地理知识的好奇心和世界各民族及其服饰种类的空前增加。印刷文化给普通人带来了世界意识。

大众文学作品,如《八十天环游世界》等,以高度自觉的形式重新增加了来自旅行记的材料,不仅对成年人,而且对更年轻的读者也有吸引力。

虽然欧洲人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叙述众所周知,但是也有一些非西方旅行家用自己的语言出版了游记,如对日本影响巨大的知识分子福泽谕吉的著作和 1866 年中国清政府官员从斌椿出使欧洲开始的使节们的游记^③。这种全球意识并不意味着一种平等或互相尊重的感觉。正如玛丽·路易斯·普拉特所言,许多游记展示了一种“帝国的眼光”——优越感和帝国的统治地位是理所当然的景象。的确,19 世纪后半期最有影响的思想体系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极端的种族主义者,按照社会发展水平把人类共同体划分为等级。但是在另一个极端,常常扎根于慈善和尊重其他宗教和民

① 人类网络的发展是 J. R. McNeill and William McNeill, *The Human Web: A Bird's 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2003), 特别是在第七章“漫长的 19 世纪”的中心话题。同样有参考价值的讨论参见 Jurgen Osterhammel and Niels p. Petersson, *Globalization: A Short History*, tr. Dona Gey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1 - 27.

② C. A. Bayly,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 - 1914* (Oxford: Blackwell, 2004), p. 1, pp. 12 - 21.

③ 令人惊奇的是,研究全球化历史的学者们很少注意“全球意识”这个问题。Alex MacGillvray, *A Brief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arroll and Graff, 2006) 讨论“全球化的目的”为“世界的形状是球形的并且不太大的意识”(第 27 页),还讨论了全球一体化的前提,把它定位于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但是不考虑更广泛人口的意识。斌椿:《乘查笔记》(台北,1970 年重印版)最初出版于 1868 年左右,是第一部半官方长篇私人旅行日记。



族制度的博爱主义冲动开始达到国际的甚至全球的程度。这包含在诸如“红十字会”（它具有国家和国际因素）等组织之中，也包含在终结大规模滥用职权的努力，如终结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统治下的刚果的恐怖爆炸事件^①。

政治进程提供了这些全球化的种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的例子。世界历史学家很少关注政治发展。政治全球化常常被认为已经失败了，“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不能终结冲突和维持政治秩序常常被援引为例。但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19世纪政治世界的全球重要性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加突出。1800年前，国际政治被分裂为众多地区体系或网络：例如，欧洲国家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相关，虽然稍显牵强）；把东亚和东南亚联系起来的朝贡体系；在印度和南亚，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一群土著掌权者混合组成一个体系；美洲是一个欧洲帝国与后帝国时期的殖民地国家和美洲土著人政权并存的体系。在任何网络中，政府和王公都很少意识到其他网络中的政治操纵者的存在。正是在19世纪，这些体系融合为单一的全球政治网络，这主要是欧洲扩张的结果。虽然19世纪欧洲的帝国在非洲和亚洲大多数地区扩张，但是人们不能仅仅关注这一点。被认为是独立的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奥斯曼帝国、美洲的新兴国家）都被融入了所谓“国际社会”。国际社会是围绕国家体系而形成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彼此承认，通常彼此平等地对待，通过外交途径、利用国际法、参与国际组织等方式处理彼此的关系。的确，全球性国际社会的形成比欧洲帝国持续的时间更长：当反殖民化发生时，以前的殖民地也被融入了国家体系^②。

在全球性国际社会建立过程中，有获利者，也有失败者：领土国家是唯一的竞争者，较小的土著国家常常被消灭；随着19世纪中期国家“统

①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Seco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8). 关于红十字会与中国的关系，参见 Caroline Reeves, “From Red Crosses to Golden Arches: China, the Red Cross, and the Hague Peace Conference, 1899 – 1900,” in *Interactions: Trans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World History*, eds. Jarry H. Bentley, Ranate Bridenthal and Anand A. Ya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关于比利时刚果反对虐待劳工的运动，参见 Adam Hochschild, *King Leopold's Ghost: A Story of Greed, Terror and Heroism in Colonial Africa* (New York: Mariner, 1999).

②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David Hel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 1.



一”(例如意大利、德国、日本和被称为“西方扩张”的美国),中央集权国家兼并了许多独立的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如美国的印第安人部落)。幸存下来的国家变得越来越相似:通过线性边界确立领土范围、高度中央集权于首都。从行政上看,国家也正在变得相似,内阁制度和职业文官变得普遍了,君主的权力削弱了,在一些国家,君主制度甚至被废除了。国家还越来越卷入日常生活事务:直接征税、更多地投资教育、警察和征兵制度等^①。

1838—1880 年,中国融入全球政治体系。世界历史学家倾向于从经济角度关注两次鸦片战争。虽然贸易是这些冲突的根本原因,但是英国也希望强迫清帝国与欧洲世界建立新型的政治关系:或者换句话说,使中国融入正在扩大的国家体系。战争之后签订的条约(特别是 1858 年和 1860 年的条约)给中国强加了当时欧洲和美洲流行的外交实践,包括互派外交使节、公使,在其他国家的首都或城市设立使领馆等。对英国——直接得到法国支持,间接得到美国和俄国支持——来说,现有的亚洲国家之间关系的体系,特别是等级森严的朝贡体系,是难以接受的。欧洲人视自己处理政治关系的方法为“文明的”,期望其他国家也接受。随着诸如蒸汽机、来复枪、制作复杂的大炮等新技术,欧洲人用武力把这些也强加于中国。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承认欧洲外交模式和国际法具有重要的后果:他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行政管理机构去管理国际关系,包括设立一个新的外交衙门(“总理衙门”),他们需要训练职业翻译人员和外交官,学习国际法以及如何利用国际法为中国谋利,以解决国际争端和解释条约权利^②。

19 世纪清政府的国际政治经历也是全球一体化的表现。不平等条约中条款与 19 世纪 30 年代后期强加给奥斯曼帝国的条款既相似,又不同。同

① 关于 19 世纪 60 年代前后新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参见 Charles Maier, “Consign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 History: Alternative Narratives for the Modern Er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 3 (June, 2000), pp. 813–825. 笔者的分析取自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1990–1992* (Oxford: Blackwell, 1992).

② 从稍微不同的角度看中国适应国际外交的讨论,参见 Immanuel Hsu, *China Enters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关于总理衙门,参见 S. M. Meng, *The Tsungli Yamen: Its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 (Cambridge MA.: East Asian Research Institute, 1962) 和 Jennifer Rudolph, *Negotiated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Zongli Yamen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thaca: Cornell East Asian Series, 2008).



样的不平等条约规定被强加给日本和泰国政府。清朝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译者注），旨在引进新技术——特别是具有战略价值的军事技术——与奥斯曼帝国的坦志麦特改革、日本“明治维新”和泰国朱拉隆功国王的改革极其相似。在这些国家，内忧外患导致国家组织机构的转型，它们力图勘定边界，把边远地区纳入政治经济核心区域。到20世纪初期，这些19世纪初期还差异很大的国家不仅已经变得彼此极为相似，而且与欧洲和美洲的国家也极为相似^①。

20世纪中国政治领域也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了全球意识的出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虽然清朝统治者公开与欧洲世界（也许连康熙皇帝都感到吃惊的方式）隔绝，但是这种政策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了。19世纪40年代后期，福建巡抚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为清政府官员阶层呈现了来自西方的全球地理知识，并附上了政治学和人类学知识的注释。到19世纪80年代，精明的外交家曾纪泽是国际关系的敏锐观察家。他以机警的眼光看待国际法：徐继畲和曾纪泽都承认国际法为一种合理的标准框架，有助于外交活动；但是曾纪泽否认欧洲的侵略行为包含了所谓“文明”的说法。到19世纪末，中国的政治思想家，无论朝野，都对政治的全球性质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例如，在1902年“灭国新法论”中，梁启超故意将中国的形势与诸如印度、波兰和埃及等丧失了独立的国家的形势相提并论^②。

19世纪的全球化是多面的：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但是对这个主题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我们能够把这个过程的许多方面拼凑起来，理出它与中国互动的大致轮廓，但还是有很大差距。与此同时，在理出这些轮廓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真实：广泛的发展如何影响个人的生活？在本文第二部分，笔者将通过考察杰出人物容闳的一生，试图探讨19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这个主题。

① 这一段引自 Richard S. Horowitz, “International Law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Siam and the Ottoman Empir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5. 4 (2004), pp. 445—486.

② （清）徐继畲：《瀛寰志略》，宋大川校注，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清）曾纪泽：《使西日记》，1890年，2：22b—23。还可参见同一作者 Marquis Tseng, “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 *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January 1887), pp. 1—11。梁启超：《灭国新法论》收录于《饮冰室合集》第6卷，第32—47页。



二

1828 年,容闳出生于澳门附近南屏镇的一个村庄。儿童时代,他被送往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1847 年,一位美国传教士带他到美国学习。1852 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并取得美国公民权。1854 年,容闳返回中国,在沿海经商。在参观南京后,容闳被太平天国运动所惊骇,于是支持清政府的事业。他作为曾国藩的幕僚参与自强运动,包括江南制造局的事务。容闳致力于“中国留美教育计划”的创立和管理工作,该计划于 1872—1881 年间派遣了 120 名中国幼童赴美学习。在此期间,他还扮演外交官角色,曾经担任特使,调查秘鲁华工的待遇;担任清政府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的副使。当“留美教育计划”因遭到激烈批评而夭折时,容闳被罢免了所有官职。他退隐到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与美国妻子和两个儿子一起生活。但是 1895 年他返回中国,参与清政府银行制度改革和修筑铁路的事务。1898 年,他卷入改革运动(戊戌变法——译者注)。后来他于 1900—1903 年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12 年,容闳卒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①。

容闳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童年的旅行和学习幸运地得到传教士的资助,天赋和人格使他的幸运发挥到了极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有机会从事商业和担任官职,这是只有少数人才有的经历。然而,尽管他的特殊经历非同寻常,但是他一生的经历清楚地包含了当时全球一体化的信息。容闳的自传充满了前文所述的 19 世纪全球化因素:全球网络的发展、全球一体化的出现、全球意识的发展。

网络——商业的、政府的、个人的——延伸和利用构成了容闳的一生。虽然很少受到人们的注意,但是容闳的第一个职业是商人。19 世纪 50 年

^① 关于容闳的论著很多。最有用的学术论述是 Edmund Worthy, “Yung Wing in Americ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34.3 (1965): pp. 265–287; 但 Thomas 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7–52 和 K. Scott Wo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 Three Chinese Views of America”, *American Quarterly* 48.2 (1996), pp. 201–232 也很有帮助。容闳的自传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1909) [此后引文注为 *My Life*] 是最详细的资料。虽然偶尔不准确和一些明显的遗漏,但是总体说来,《我的生活》可以与其他史料互相印证。



代中期,他开始独立经商:从事翻译工作,在上海作为丝绸和茶叶采购代理,特别是冒险从太平天国控制地区收购茶叶,然后转运到通商口岸销售^①。在通商口岸,他的语言能力使他成为非常有用的跨文化中间人。与此同时,他不喜欢处于这种现成结构中的地位。他放弃充当一家英国贸易公司买办的机会,觉得“虽然有利可图,但是与仆人无异”,不屑一个耶鲁毕业生为之。虽然买办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是一个关键角色,且本身常常就是大商人,但在通商口岸,外国商人习惯于把买办视为仆人而非同僚。所以容闳坚持既不按照合同也不根据委托而从事商业,但他显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②。1873年,作为“留美幼童教育计划”的一部分,容闳在美国说服格特林大炮制造商让他担任它们的代理商。他回到中国,说服清政府购买了50门格特林大炮,价值超过10万美元^③。在一次商业冒险中,容闳遭到彻底失败。1897—1898年,他试图建造从天津到镇江的铁路。这个建议似乎从一开始就预示着危险:德国政府坚持铁路不许经过山东省境内,美国政府拒绝支持容闳,他从国内外筹款的计划也失败了^④。在上述每个事件中,容闳利用或者企图利用他的语言技能和对外国文化的熟悉,扩大贸易和投资网络——在他看来,这有助于中国的发展。

后来容闳视为其“终生”工作的“中国留美幼童教育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容闳发展的私人和政治网络。19世纪60年代初,他经朋友引荐给曾国藩,代表曾国藩到欧美各国考察,为江南制造局采购设备。此后容闳被授予官职,游说朋友山东道台丁日昌支持派遣中国幼童赴美学习英语、科学、机械工程和其他技术,为中国现代化培养所需要的人才。

1870年秋,丁日昌请求曾国藩就此事向皇上呈递了奏折。1871年春,曾国藩和李鸿章制订了详细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派遣120名幼童分批赴美留学。这些幼童将在美学习15年,完成中学教育并升入大学。容闳被任命为“留美幼童教育计划”的副总监——仅次于曾国藩的幕僚、1854年考中

① *My Life*, pp. 67 - 95, pp. 123 - 136.

② *My Life*, pp. 77 - 78. Hao Yen-ping,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③ *My Life*, pp. 171 - 172, pp. 191 - 192, pp. 237 - 238; Worthy, pp. 275 - 276.

④ *My Life*, pp. 237 - 238, Worthy, p. 283; Charles Denby and E. P. Allen, "Chinese Railroad Develop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Engineering Magazine*, 16. 3 (December 1898), p. 345.



进士的陈兰彬。1872 年,容闳返回美国,监督实施新的留学计划。他利用耶鲁和蒙松预科学校发展的朋友网络,把留美幼童管理总部设在康涅狄格河谷,办公室设在哈特福德和斯普林菲尔德,留美幼童(根据耶鲁校长的建议)三五成群地分散于两地之间的城镇居民家中,以便他们能够快速学会英语和适应美国方式^①。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当“留美幼童教育计划”遭到批评和受到提前结束的威胁时,容闳再次利用耶鲁的关系,找到他的朋友约瑟夫·特维彻尔,得到一群美国杰出人物的帮助,包括耶鲁校长诺亚·波特,记者和外交家约翰·鲁塞尔·杨和马克·吐温,他们都游说总理衙门继续实施幼童留美计划^②。

容闳既被包括在全球一体化之中,又是全球一体化某些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年轻时期来到美国,像许多欧洲出生的移民一样,他变成了美国公民,但又没有放弃对祖国的忠诚和义务。在一个经济变化导致空前规模的移民、新的交通和通信技术使移民能与故土保持联系的时代,没有什么事情是异常的。由于年轻,容闳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双重身份的冲突。作为受过美国教育的人,容闳认为在现代世界中,美国教育比中国传统的制度更有用处,所以他试图利用教育计划为他人复制这种经验,“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可以复兴,变得文明而富强”^③。

但是我们从容闳身上看到的全球化并非一直是和谐或富有成效的。全球一体化遇到了激烈抵制:这在中国第二批留美幼童计划中显得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新兴的美国劳工运动不能超越狭隘的种族主义来看待中国人——种族主义者认为,中国劳工缺乏进行自我选择的自由,缺乏美国公民具备的道德水平和其他特性。对中国人的攻击受到以下文化偏见的大力支持:种族界限和社会行为不可改变。虽然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的爱

① 关于留美幼童计划,参见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史料》第 2 卷,第 153—199 页。二手史料参见 Thomas LaFargue,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 Government Experiment in Western Educa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1.1 (1941): pp. 59–70; 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William Hung, “Huang Tsun-Hsien's Poem ‘The Closure of the Educational Mission in Americ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8 (1955): pp. 50–73; Edward Rhoads, “In the Shadow of Yung Wing: Zeng Laishun an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74.1 (2005): pp. 19–58.

② *My Life*, pp. 210–212.

③ *My Life*, p. 41.



尔兰人与中国人具有很多相同点，但是种族主义者对此视而不见。容闳成了人们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因为他成功地融入哈特福德社会，他流利的英语、从容的举止、美国化的方式都给那些指控中国人“肮脏”和不能适应美国方式的人提供了一个反证。1875年，容闳与美国女士玛丽·L·克罗格结婚，这成为当时美国新闻界广泛关注的事件，后来他们的孩子出生也是如此^①。由于外交官陈兰彬、容闳及其后继者坚持不懈地为在美华工争取权利，所以在1868年条约中，美国政府予以承认。但是在美国工党及其领袖丹尼斯·柯耐等偏执狂眼里，中国外交官的努力只是“旨在把中国人遍布美国各地的一个阴谋”^②。19世纪80年代早期，反华运动成功地迫使联邦和州政府通过了歧视性的反华立法。在这方面，容闳的结局是悲哀的。1898年，当他试图说服美国支持他修筑从天津到镇江的铁路计划时，美国国务院竟然援引排华法律，拒绝承认容闳的美国国籍。这个决定是荒谬的，因为排华法是在容闳加入美国国籍几十年之后才通过的，他沮丧地发现，他的美国朋友都是爱莫能助。当容闳1902年返回美国时，他的移民身份是不明确的，但是他勇敢地步行经过旧金山移民局以壮声势，移民局官员显然不能阻止他，因为他穿着西装^③。

但不仅仅是美国人不适应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融合和文化后果，“留美幼童教育计划”越来越受到清朝官员的批评。虽然对教育计划的开支和在美华工的待遇的关注无济于事，但是对教育计划的许多批评集中于流回国内的报告说留美幼童正在过分美国化。负责留美幼童的更保守官员吴嘉善报告说“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行未坚……实易沾其恶习”，建议从速撤回留美幼童^④。继曾国藩去世之后主管“留美幼童教育计划”的李鸿章报告说，容闳拒绝了其他官员（如陈兰彬）

① “Yung Wing Marries a Connecticut Lady”, *New York Times*, March 2, 1875; “Yung Wing Marries a Connecticut Girl”, *San Francisco Bulletin*, March 8, 1875. See “Chinese; Mrs. Yung Wing”, *New Haven Evening Register*, January 30, 1879; Worthy, pp. 276–277.

② Worthy, pp. 279–280. *The Speeches of Dennis Kearney, Labor Champion* (New York: Jesse Haney and Co, 1878), p. 13.

③ *My Life*, pp. 237–238, Worthy, p. 283; Charles Denby and E. p. Allen “Chinese Railroad Develop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Engineering Magazine*, 16. 3 (December 1898), p. 345. “Inspector Did Not Recognize Chinamen’s Nationality”, *Philadelphia Inquirer*, July 13, 1902.

④ YWYD 2; p. 165.



希望加强留美幼童学习中国文化的努力。1881 年,总理衙门召回留美幼童的奏折被准允了^①。

人们一般都指责保守的中国官员导致留美幼童被撤回,但是容闳也负有责任。他既不能与陈兰彬(他并没有容闳所说的那么保守)合作,也不能与性格怪异的吴嘉善合作^②。此外,他认为李鸿章缺乏曾国藩那样的远见,屈服而不是抵制对“留美幼童教育计划”目的的批评。但是容闳显然没有打消李鸿章对替代课程的疑虑。李鸿章显然对中国驻美使节之间的争吵感到厌烦^③。容闳对中国政治和文化氛围缺乏了解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坚持包括体育课在内的美国教育的价值——即自由思想,但是这种教育价值观在当时的中国教育中没有立足之地。容闳不明白,为了这个计划的成功,为了返回中国后成为有影响的人物,这些留美学生需要牢固掌握中国文学、熟悉儒家经典。对外国习俗影响的关注不仅仅是少数官员。人们几乎难以想象当时最大的儒家学者之一曾国藩会容忍一种完全忽视中国学术的教育使命。的确,留美幼童教育计划最初的管理规章明确规定:除了西方学术外,留美学生将被教授标准的儒家经典著作,如《孝经》,并在《五经》学习方面取得不断进步^④。虽然规模小得多,但是就像美国西部反华运动一样,对中国幼童美国化的教育计划的批评也是由全球化、特别是全球一体化腐蚀而引起的社会和文化冲突的人为事件。

虽然容闳一生的大部分都体现了全球意识的诞生,但也许没有哪段插曲比他赴秘鲁进行华工苦力贸易调查那么明显。苦力贸易始于 19 世纪 40 年代,因为非洲黑奴贸易被禁止后,热带种植园主急需寻求替代劳工。福建和广东两省由于人口压力、社会和政治动荡,有向东南亚移民的悠久传统,所以它们成为招募华工的主要地点。因招募和运输过程中普遍使用武力威胁、在工作场所虐待华工,与古巴和秘鲁的所谓“苦力贸易”变得

① 关于这个事情最可靠的叙述也许是李鸿章于 1881 年 3 月 29 日写给总理衙门的一封信件 (GX7.2.30), 参见《洋务运动史料》第 2 卷,第 177—179 页。至于对造成“留美幼童计划”终结的讨论,参见 William Hung, “Huang Tsun-Hsien’s Poem ‘The Closure of the Educational Mission in Americ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8 (1955): pp. 50—73.

② 关于陈兰彬,参见 Charles A. Desnoyers, “Self Strengthening in the New World: A Chinese Envoy’s Travels in Americ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0.2 (1991), pp. 195—219.

③ *My Life*, pp. 202—203.

④ YWYD 2: p. 158.



臭名昭著。苦力贸易本身是一种跨国商业：由于被称为“客头”的经纪人使用各种非法手段招募（甚至拐骗）劳工，把他们转手卖给外国商人，然后由外国商人把这些劳工出售给各国船长（包括英属美国人、葡萄牙人），由这些船长把劳工运输到国外。殖民地香港和澳门港口是劳工招募和转运的据点。劳工在陆地和海上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死亡率非常高。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深知苦力交易的弊病。19世纪50年代，中国几座港口城市爆发了几次严重的大众骚乱，反对苦力贩子虐待劳工。正如罗伯特·埃里克所指出的，清政府官员试图阻止苦力贸易，并逮捕了一些罪犯，但是他们受到外国商人滥用治外法权保护苦力贩子和相关人员的阻挠。1860年，迫于英、法两国立法管理劳工招募的压力，1866年，总理衙门颁布了一系列管理条例，积极根除虐待劳工的现象，但是这些努力并未得到外国列强的认可，因为列强担心这些规定将强加给雇主。正如苦力贸易是一种跨国企业一样，阻止苦力贸易也需要一种国际努力^①。

19世纪70年代早期，废除苦力贸易的必要条件成熟了。其背后的推动因素不是经济的，而是人道主义的，即根源于对奴隶制度邪恶认识的全球意识。随着英语新闻猛烈抨击苦力贸易复兴了非洲黑奴贸易的邪恶，所以1872年，英国当局禁止把香港作为转运苦力的船只的停泊地，澳门从此成为苦力贸易的重要港口。清政府在与外国列强的合作下，向葡萄牙施加压力，要求结束澳门作为苦力贸易的重要转运站^②。在1872—1876年的艰苦谈判中，总理衙门和李鸿章最终迫使秘鲁和西班牙在条约中同意终结苦力贸易。

容闳在处理与秘鲁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73年李鸿章视察天津时，要求容闳与秘鲁代表会谈，他坚决反对否认中国劳工遭受虐待的事实。后来，容闳受命赴秘鲁、陈兰彬受命赴西班牙调查中国劳工的状况。陈兰彬带了两个来自海关的助手，于1874年访问了古巴，1876年出版了英文版的报告，该报告摘录了1176件处理结果，提供了可怕的苦力贸易的实物文献。在约瑟夫·特维切尔神父和E. W. 克罗格的陪同下，容闳于

① 关于全球视野的简短综述，参见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7)，特别是第三章。Robert L. Irick, *Ch'ing Policy Toward the Coolie Trade, 1847 - 1878*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82) 是一部详细的外交史。

② Irick, pp. 232 - 272.



1874 年秋天访问了秘鲁,开始收集大量证据和其他材料,其中包括“24 张中国苦力的照片,照片上的苦力背部被鞭子抽打得皮开肉绽,伤痕累累……我知道这些照片将向世人揭露种植园主犯下的残暴罪行,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容闳认为这些照片在争取中国劳工更多权利的谈判中特别能发挥作用。虽然容闳的调查报告从未发表,但是它似乎印证了陈兰彬的结论。两人在终结苦力贸易和改善华工待遇的最终补充协定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①。

苦力贸易的停止是中国融入更广泛的全球共同体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改变了中国官员长期忽视海外华人的观念,使他们意识到再也不能这样听之任之了:首先,世界互相联系太紧密了,再也不能继续认为中国领土之外发生的事情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很小了。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中国在国外建立的许多使领馆就是这种变化的例子^②。此外,如容闳那样天赋极高的移民经验也告诉清政府官员海外华人可以提供许多东西。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清政府试图获得海外华人的技术和资金,而改革和革命运动也转向这些海外华人社团寻求支持。其次,它表明在苦力贸易问题上全球意识的扩大。19 世纪世界见证了摆脱奴隶制和农奴制,许多国家可以为例,如美国内战、俄国废除农奴制^③。容闳使用照相技术记录华工悲惨处境的决定、总理衙门发布一份英文版的陈兰彬报告等,都是基于以下信念:证据将为普通人的感觉提供强大的视觉冲击,这种普通人的感觉将带来变革的压力。的确,在一个全球意识不断增强的时代,这些普通人的感觉包括了以下认识:人类共同体已经跨越了种族、阶级和民族的藩篱。在这方面,他们是正确的;这种认识终结了强制性的苦力贸易。

① *My Life*, pp. 191 - 196, 引文出自第 195 页; Desnoyers, “The Thin Edge of the Wedge: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nd 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 in the Americas, 1872 - 1875”,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1. 2 (1992) pp. 253 - 257. 关于秘鲁谈判的详细情况, 参见 Irick, pp. 317 - 367. 陈兰彬小组的报告被重印为 *The Cuba Commission Report: A Hidden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Cuba; The Original English-Language Text of 1876*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

② Irick, pp. 373 - 387; Yen-ching Hwang, *Coolies and Mandarins: China's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 (1851 - 1911)*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③ McNeill and McNeill, pp. 252 - 258.



三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广东全境和澳门的苦力贸易也许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商业，但是中国卷入世界经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影响是极其有限的。19 世纪中期，这种局面开始发生变化：向外移民、商业和经济发展、军事冲突和外交活动都促使中国更深刻地卷入全球共同体。到清王朝最后 10 年，中国卷入世界的重要性、全球化对中国生活的影响都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了。

通过考察 19 世纪全球一体化，我们可以看出三个各自独立又互相重叠的进程：全球网络的延伸、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和全球意识的发展。这些进程在中国都表现得很明显，并开始改变中国的社会生活、经济、景观和普通人的经历。通过考察个别人的经历，这些发展变得更加清晰：容闳就是其中之一，他跨越中美文化与社会界限——适应其中任何一个都是不容易的。在其他情况下，这也许使他变成了一个边缘人物，但是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跨越语言和文化边界的能力使他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人。虽然我们从容闳身上看到了一种不寻常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能够告诉我们许多关于 19 世纪全球一体化及其对中国人民产生影响的方式。

（施诚 译）



Yung Wing's World: China in the Global Nineteenth Century

Richard S. Horowitz

History Departmen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China's involvement in processes of global integration during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rgues that assertions that China remained isolated from global processes in this time period are exaggerated. Nineteenth century globalization had three key characteristics: the emergence of networks that crossed regional, national and continental boundaries;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uniformities; and an emerging consciousness that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states were part of a global human community. Chinese society was influenced by all three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essay uses as a case study the life Yung Wing (1828 – 1912), a Chinese man edu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worked as a businessman and as a Qing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 and was later a political activist i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Yung Wing's personal life, political, business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show the impact of global networks, uniformities, and consciousness on the life of an individual, and offer a window into the dramatic impacts of global integration on China between 1840 and 1914.

Keywords: Yung Wing, nineteenth century, globalization, China, 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self-strengthening, Qing dynasty

The "West" in the Eyes of Late Qing Reformers: A Focus on Kang Youwei and Liang Qichao's Euroamerican Travel Accounts

Cao Yinglong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st-Opium War era saw a collaps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of Tianxia centering on a Chinese-barbarian distinction, and those Chinese with intellectual foresight began to reexamine the world in the hope of constructing